



贸易放缓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贸易放缓部分受到结构性因素而非周期性因素的影响

克里斯蒂娜·康斯坦丁内斯库、
阿迪特亚·马图、米歇尔·卢塔

世界贸易增长出了什么问题？自2010年从大衰退的历史低谷中恢复过来后，世界贸易的增长始终维持着出人意料地缓慢速度。

2012年和2013年，贸易增长不足3%，而危机前的平均水平为7.1%（1987—2007年；见图1）。40多年来，贸易增长第一次低于全球经济增长。经济学家们想弄清楚当前的全球贸易放缓是一个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自行修正的周期性现象，还是有着更深层、更持久（即结构性的）的决定因素——以及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世界贸易的未来和收入增长意味着什么。

是周期性，还是结构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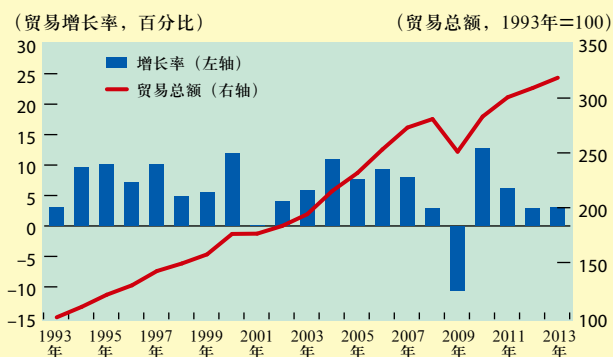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全球贸易放缓主要是一种周期性现象，其驱动因素是近年来一直困扰着欧洲的经济危机。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实证支持。欧盟大约占世界贸易总量的1/3，因为按照惯例，欧盟国家之间的贸易应计入世界贸易总额之内。经济危机降低了欧洲的进口需求。2012年，经济危机的震中地带——欧元区的进口量下降了1.1%，2013年仅上升了0.3%。从这一点上看，如果欧洲经济复苏，世界贸易增长应该会再次回升。

但周期性因素（如欧洲的危机）只是一部分原因。

回顾过去十年GDP中进口量所占的比例，会发现当前的贸易放缓有更长期的原因。虽然金融危机过后大部分经济体中进口量与GDP总量的比率较为稳定，但在危机爆发前，中国和美国似乎就已经出现了进口份额的停滞。这两个国家的进口额在实际GDP中的占比自2005年起就基本保持不变：“大停滞”似乎开始于大衰退之前，这说明存在导致全球贸易放缓的长期决定因素（见图2）。

图1
增长更加缓慢

从大衰退中恢复后，过去几年的世界贸易增长异常缓慢。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作者的计算。

这种长期的停滞的确反映了更深层次的原因：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21世纪初贸易与收入关系呈现结构性变化。在最近的一篇文章（Constantinescu、Mattoo 和 Ruta，2014年）中，我们对过去40年间贸易与收入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贸易对收入的响应能力（即经济学家所说的贸易的长期收入弹性）在上世纪90年代显著上升，但在21世纪初下降至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的水平。上世纪90年代，全球收入每增长1%，世界贸易就会相应地增长2.2%。

但是，这种贸易增速超过GDP增速两倍的趋势于世纪之交告终。进入21世纪，世界收入每增长1%，世界贸易仅相应增长1.3%。我们的研究证实，上世纪90年代贸易与收入的关系与该时期之前和之后相比经历了统计学上的显著变化。

这些结果表明，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贸易增长越来越缓慢的原因不仅在于全球收入增长的缓慢，还包括贸易自身对收入增长的敏感度大大减弱。与影响全球GDP增长的周期性因素相比，贸易放缓有着更深层次的根源。对影响贸易增长的长期和短期因素进行分析后发现，与2009年贸易崩溃相比，当前全球贸易放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结构性因素而非短期因素的影响（见图3）。

醉汉和他的狗

研究全球贸易和收入的关系就像分析醉汉和他的狗的行为一样：两者都不会沿着直线往前走，尽管如此，我们仍希望他们彼此能够靠得近一些。毕竟世界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商品和服务的交易规模必须与其经济活动相关联。

但贸易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会随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很多因素时而拉近，时而拉远两者之间的距离。

对于贸易对收入的响应能力的降低，以下是几种可能的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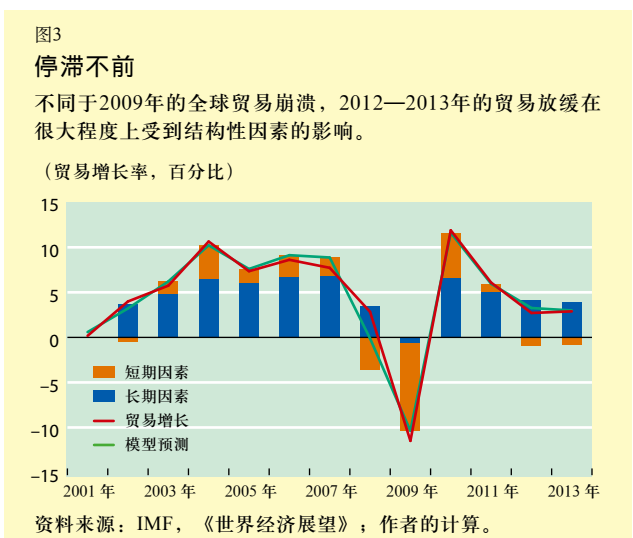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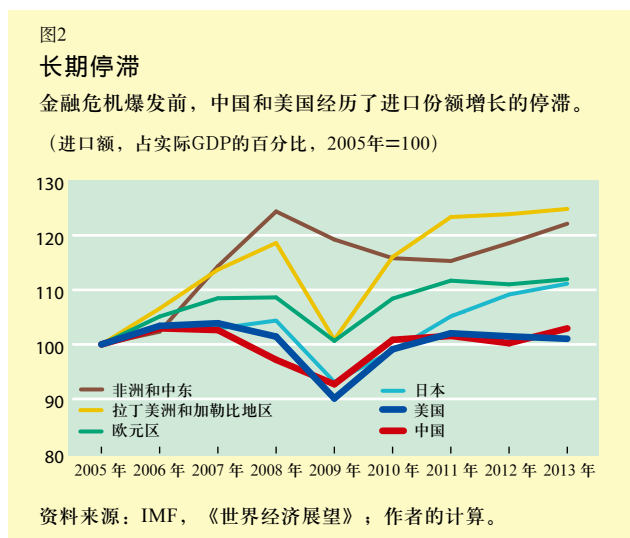
- 贸易结构的变化与全球供应链的扩张或收缩相关（见“形成链条的价值”，《金融与发展》2014年3月号）；
- 世界贸易构成的变化，如商品与服务的相对重要性；
- 世界收入构成的变化，如投资与消费的相对重要性；
- 贸易制度的变化，包括导致全球市场分散的保护主义的出现。

我们的分析显示，全球贸易和收入之间关系的不断变化主要受到两个最大的贸易经济体——中国和美国的供应链贸易变化的影响，并非受到保护主义或贸易及收入构成变化的影响。

贸易构成不是造成21世纪初贸易弹性下降的全部原因，因为近年来其构成（即商品和服务）始终处于非常稳定的状态。同样，需求构成的变化也不是其全部原因，因为长期投资和贸易的消费弹性也是类似的情况。最后一点，保护主义的增强并不显著——即便在金融危机后的一段时间里也是如此，这说明贸易政策仅是造成世界贸易弹性下降的很小一部分原因。

一项针对国家层面的分析表明，美国和中国都经历了贸易对增长的响应能力的显著下降（美国从3.7下降到1.0，中国从1.5下降到1.1）。与之相比，欧洲未表现出明显变化。其他地区的贸易弹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是这些地区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很小，因此几乎无法作为世界贸易弹性改变的原因。

区域和国家层面的贸易与收入关系的波动与国际贸易结构的不断变化有关。中国提供了经济力量发挥作用的例子。



不断变化的供应链

上世纪90年代，贸易收入弹性的增强可能反映出国家间生产活动的日益分化（Escaith、Lindenberg 和 iroundot，2010年）。20世纪90年代，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冲击导致全球供应链的迅速扩张，用于加工和再出口的零部件的进口数量大增，中国的进口量增长尤其显著。因此，零件来往贸易的增长促使量化贸易增速超过了国家收入。

反过来，中国贸易弹性的下降可能预示着中国在国际生产中的角色发生了进一步的改变。已有部分证据表明，或许21世纪初期中国的国际供应链已经成熟，导致中国贸易对GDP的响应能力下降。这一变化在中国出口总额里零部件进口份额的下降中得以体现，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60%的峰值下降到当前的35%左右。

2012—2013年间的放缓在未来几年可能会持续下去。

所有这些改变并不意味着中国将要背离全球化。出口总额中零部件进口份额的下降确实反映出中国企业用国内投入代替了国外投入，中国企业不断增长的国内附加值为这一发现提供了证据（Kee 和 Tang，2014年）。但是，国内可用投入的增长一直与外国直接投资相关。这些改变可能还表现在地理位置方面，中国沿海地区已经开始更多地从国内采购，其原因是国内的运输和通信成本下降的幅度比全球其他地区更大。当前的贸易一体化可能更多采取国内贸易而非国际贸易的形式，但官方统计数据往往仅体现后者。

美国贸易对收入响应能力的下降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发展趋势。美国曾是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零部件进口事业迅速发展的主要源头以及组装产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上世纪90年代，美国企业不断在境外重新安置生产基地，当时的贸易似乎能在更大程度上响应收入的变化。近年来，虽然离岸贸易并未减少，但国际分散的速度似乎有所减缓。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制造业进口额在GDP中的份额始终保持在8%左右，而在此前的15年中，其进口份额将近现在的两倍。

与中国和美国相比，21世纪初欧元区贸易对GDP的响应能力居高不下。这可能是供应链从欧元区国家（如德国）向东欧和中欧持续扩张的结果。

新旧驱动力

全球贸易放缓是否会持续下去？它是否会对世界经济增长和试图以贸易驱动增长的国家产生影响？我们的发现显示，2012—2013年间的放缓是受到贸易和收入关系的结构性（因此更加持久的）变化的影响，这说明在未来几年，这种状态可能会持续下去。世界经济的发展潜力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因为贸易和收入两者间并非毫无关联。

但是我们还必须意识到，造成贸易放缓的贸易与收入不断变化的长期关系象征着国际生产模式不断变化。上世纪90年代，贸易对增长的高响应度反映了生产的日益分化，美国和中国共同促进了这种分化。如今这个特殊的驱动引擎似乎耗尽了它的推动能量。但欧洲仍然存在大量增加国际分工的机会，这对于尚未充分利用全球供应链的地区（如南亚、非洲和南美洲）的未来非常重要。二十国集团的发达和新兴经济体的贸易议程将发挥一定的作用，以确保把握住这些机会。■

克里斯蒂娜·康斯坦丁内斯库（Cristina Constantinescu）和米歇尔·卢塔（Michele Ruta）分别是IMF战略、政策和检查部对外部门的助理研究员和高级经济学家；阿迪蒂亚·马图（Aaditya Mattoo）是世界银行贸易和国际一体化部的研究主管。

参考文献：

Constantinescu, Cristina, Aaditya Mattoo, and Michele Ruta, 2014, "Global Trade Slowdown: Cyclical or Structural?" (unpublished; Washington: IMF and World Bank).

Escaith, Hubert, Nannette Lindenberg, and Sébastien Miroudot, 2010, "International Supply Chains and Trade Elasticity in Times of Global Crisis," WTO Staff Working Paper ERS-2010-08 (Geneva: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Kee, Hiau Looi, and Heiwai Tang, 2014, "Domestic Value Added in Exports: Theory and Firm Evidence from China" (unpublished; Washington: World Bank).